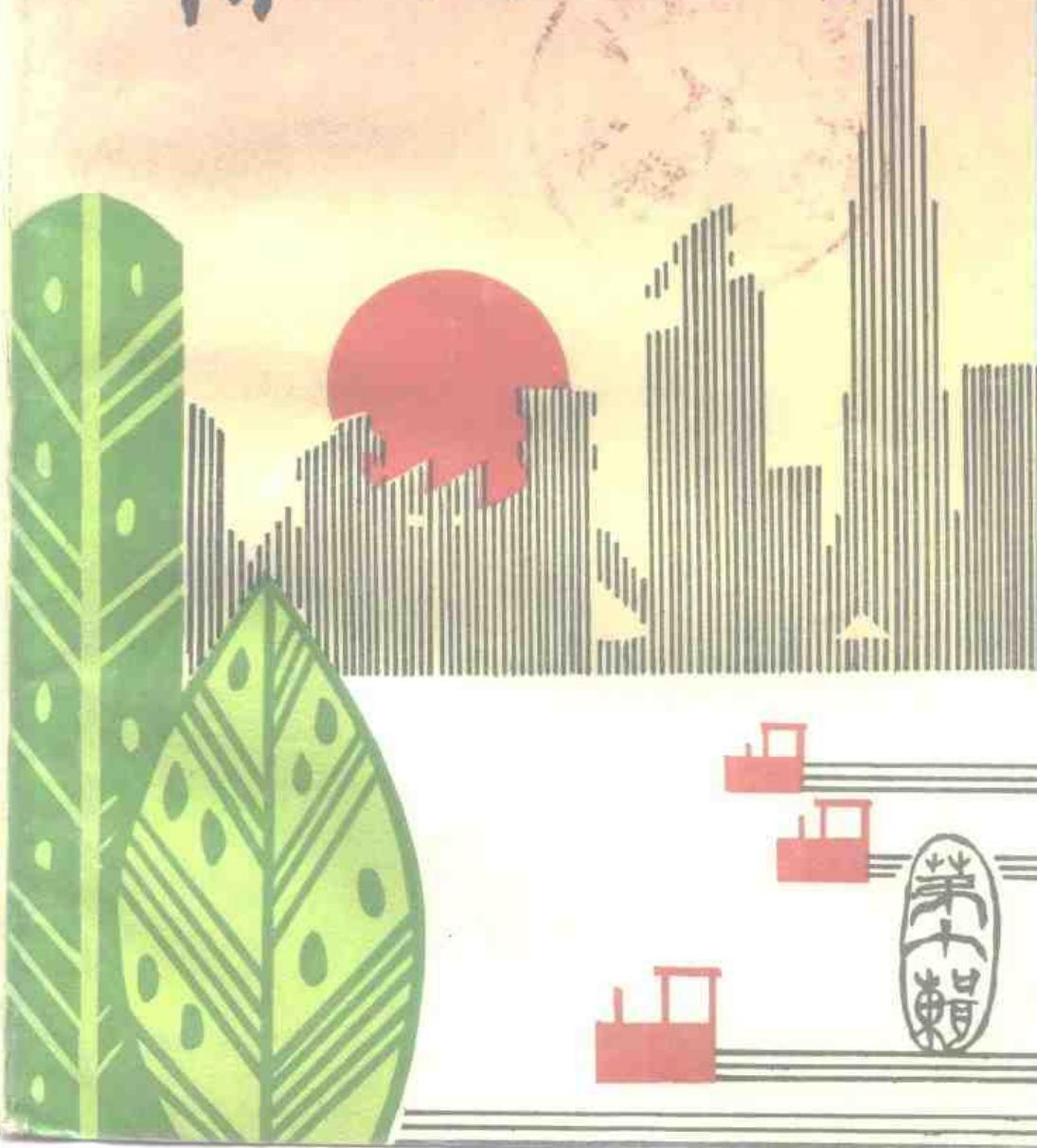


1215

余古園津



漆园古今

文史资料第十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蒙城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92年10月

《漆园古今》第十辑目录

当代风云

解放初期城南区的“双减”与“增资”斗争

-文一兵 (1)
忆反匪反霸工作陈怀孝 (4)
韩油坊的一次公审大会李蕴华 (7)
蒙城县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徐嵩 (9)
潘沟沟北农业初级社的创办谢如美 陶明山 (14)
乔如宝和他领导的互助组张志廷 (16)
蒙城县开展统购统销前后的粮食工作
.....张啸山 卢超 (18)
庄周公社的“新三反”与“纠五风”刘朝君 (20)
记蒙城担架独立团卢坤 (30)
送土布支援淮海战役宋修己 楚景禹 (33)
记渡江战役中的支前工作邵杰英 楚景禹 (34)
我参加了渡江支前工作张文焕 张俊岭 (36)
淮海战役支前中的一件小事暖雨 (37)

山桑烽火

- 张油坊战斗于世堂 (38)
买药记吴怀喜 茄文斗 (41)
忆宋均同志在三义胡月恒 (48)

- 一座假坟的来历 刘水 (50)
 八根杉条支前线 郑兆山 焦佩武 (51)
 巨寇火烧八里坤 胡洪学 (47)
 赵书记单身引敌 杜学孟 (53)
 解放前夕见闻一则 任茂生 (54)

古城春秋

- 民国时期的蒙城县立民众教育馆 张国光 (59)
 过之翰夫妇冒险追悼冯玉祥 过家武 (72)
 漫话蒙城涡河水运船舶及码头 邓涛 常树屏 (74)
 红枪会血战直鲁联军 张志廷 于长茂 (79)
 五十一军独立团抢渡涡河纪实 段学鹏 (81)
 张祥云血战紫金山 曹光复 (83)
 马忍言县长倡办牛痘传习所 王胜兴 (85)
 太平庄的来历 黄建华 (87)
 返乡纪实 李蕴华 (89)
 马金章剿匪补记 陈洪昌 (92)
 一场警官梦 陈蕴才 (95)

漆园人物

- 过氏三兄弟 单九亭 (97)
 清末爱国将领黄绍甫 葛建球 丁华美 (113)
 邓长安其人 冷如冰 (114)
 蒙城教坛名人丁煥曾 丁洪德 (116)
 丁齐及其族裔 丁书成 丁怀良 (118)
 徐青霄先生轶事 张克生 (120)
 程洪森同志事略 邵长亮 (124)
 土专家王其昌 杨树森 (128)

往事追忆

- 在坛城开展抗日工作的回忆 都志 李元龙 (130)
忆淮海战役中的两件事 张茂德 (132)
跟随邵光同志一起工作的回忆 徐九铸 (135)
张治中先生视察蒙集人民公社 李树林 段学鹏 (139)
两位烈士殉难记 刘金芳 康贺武 (141)
忆几位治淮劳模 陈洪昌 (143)
回忆一次救灾工作 焦佩武 (145)
虫口夺粮 李蕴华 (147)
一起沉船事件 郑兆香 戴理 (148)

教坛史话

- 蒙城县幼儿教育四十年 何兰春 (150)
蒙城初师的兴建及其教育质量
..... 陈周仁 马亚平 张礼锋 (159)
蒙城县文化艺术学校始末 陈晓亭 (162)
蒙城县机关干部文化学校概况 王从理 (164)
马忍言视察双涧抗敌小学 张茂德 (167)
抗战时期蒙城师生的艰苦生活 王登三 李琳 (169)
西关村幼儿园 孟凡训 (171)

社会工商

- 民国时期的蒙城金融事业 单九亭 (174)
民国时期的货币与通货膨胀 母连祥 (178)
抗战时期的蒙城汇通茶叶转运公司 葛北辰 (180)
双涧恒春堂药店 王心同 王谦 (183)
新盛土布联营商店 李锐圣 (185)
五十年代的三义供销合作社 何万夫 (188)

蒙城县供销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

魏芳连 樊兴云 王子成 (191)

巫师行骗术 范文俊 (195)

文化与考古

- 王竟、吴一鸾建庄子祠 熊承恩 (198)
过年小考 侯定国 (200)
母壶赶考与其碑文 母连祥 (206)
八月十五送冬瓜 范春华 (208)
求雨 葛炎章 (211)
三县集始末 马成九 (213)
柳林寨的由来 郑士元 (216)
多才多艺的王守和 蔡永聚 (217)
徐幼芳老人的剪纸艺术 杨存德 (221)
卢锡学的鼓书生涯 慕光 (224)
关于“跃进诗”的回忆 张广思 (225)
往日的蒙城街头小吃 李文 王登三 (227)
大跃进时期的诗画 李如周 (229)

采风与研究

- 浅谈蒙城近现代歌谣 范文斗 (231)
淮北民间歌谣浅说 慕占民 (236)
一首民谣的注释 张皖农 (245)
治淮歌谣一首 张斌 (247)
做双军鞋好支前 陈素美 杨存德 (248)
支前小唱 于全斋 (249)
读者来信四封 (250)

当代风云

解放初期城南区的“双减”与“增资”斗争

文一兵

1948年6月，我县全境解放，区、乡政权已随之普遍建立。当时中共城南区委和区人民政府在蒙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首先向全区人民宣布废除国民党强加给人民头上的一切苛捐杂税。接着就贯彻人民政府的“以率计征，依法减免，合理负担”的政策，以减轻劳苦大众的负担。如城南路西三里杨庄与二里杨庄是国民党时期的1个甲，两庄共有杨子栋、杨子华等4户官僚地主。他们一不出工，二不出钱，将近500亩土地负担的徭役和苛捐杂税，全加在贫下中农身上。如我家有20亩地，又租种地主的10亩土地，出25亩地公差杂税，正好是全甲公差杂税的十分之一。这就是说，本来应是700亩土地负担的公差杂税，都由只种250亩土地的贫下中农承担。解放前群众负担的不合理，由此可见一斑。

解放后，通过贯彻落实党和人民政府制订的“以率计征，依法减免，合理负担”的政策以后，首先是全面丈量土地，摸清黑地，按照土质肥瘦，划出土地等级。然后将公粮和社会公益应负担的粮、款等项，均按照各户实有土地数量、质

量负担。这样以来，基本群众的负担一下子减轻了80%左右。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上初步得到了实惠，无不扬眉吐气。他们从具体的实践中体会到共产党政策的英明、正确，因而人心向共产党，个个拥护共产党。“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已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在废除苛捐杂税，贯彻落实合理负担的基础上，城南区委、区政府认为，广大人民群众虽然在政治上得到了翻身，但封建地主剥削依然存在。他们的剥削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活租，对半分红，由地主提供土地，由佃户提供劳力、种子、肥料进行生产，收益分配是各得50%。乍看起来，似乎比较合理，但仔细计算起来，佃户所得的50%，除去劳力、种子、肥料等工本投入外，实际上仅能收到25%—30%左右。二是死租，即所谓课地，地租略低于对半分红的数额。但规定不管当年遇到什么样的自然灾害，佃户都得按议定的地租如数交付。这种形式，表面上地租较轻，但对解放前“十年九灾”的旧农业来说，佃户承担的风险更大。以上两种，不管哪种形式，佃户都得承担国民党繁重的徭役和苛捐杂税。因此，佃户的收入“三下五去二”，即所剩无几了。所以他们不得不过着“一年忙到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三是高利贷剥削，每年春荒季节，有些贫雇农又得向地主或其他高利贷者借贷。一般麦前借一斗粗粮，麦后还二斗小麦。如遇天灾人祸还不上者，就得加倍偿还。四是雇工剥削；如恶霸张紫宸（号称张六王爷）、国民党乡长陶恩、保长李冠英等几户地主、都拥有二、三百亩土地，雇长工10多人。长工们一年到头起五更睡半夜，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常年给地主创造了大量财富，而年终只能拿到总收

入中不足十分之一的工资。

根据以上情况，区委、区政府发动广大贫雇农向地主、高利贷者进行减租减息和给长工们增加工资的斗争。首先是从党内到党外召开各种会议，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双减”和“增资”斗争的意义和方针、政策，以提高贫雇农对“双减”和“增资”工作的认识。接着就布置“双减”和“增资”工作的方法和时间步骤，然后以行政村为单位，召开地主分子会议，用具体的数据指出他们的剥削形式，说明“双减”和“增资”的政策。在大量事实面前，地主分子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剥削了穷人，养活了自己。政府提出的“双减”和“增资”工作，不但不是强人所难，而且是合理合法的。因此，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接受党的政策。特别是一些开明人士，如杨晋三、张子敬等人了解了党的政策以后，都主动地按照政策减租25%，在当时曾受到于群的好评。但也有一些顽固分子以各种手段干扰和破坏“双减”和“增资”斗争的顺利进行。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贫雇农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结合反匪反霸斗争，都分别给长工们增加2至3倍的工资。

通过“双减”和“增资”斗争，广大佃农、雇农在经济上进一步得到了实惠，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生产发展。同时也给1951年的全面开展土改，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忆反匪反霸工作

陈怀孝

1949年，蒙城县解放初期，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疯狂地进行捣乱和破坏。

望疃区在当时敌情最复杂，有著名的恶霸地主武济武，著名匪首贾成祥、葛亚山、葛树荣，会门头子郑凤山、蔡登高等20余人，罪大恶极，民怨沸腾。他们明目张胆继续作恶，杀害望疃区区委书记杨玉林、区长石宗礼同志及工作队员等多人；在金牛寺附近设有杀人场，埋人坑；大白天在去太和的路上，一个女学生被轮奸致死；汽车途经汪大桥被劫；土匪在街上喝酒时相互比手枪。这些歹徒横行乡里，猖狂一时，闹得望疃百姓苦不堪言。基于上述情况，蒙城县委、县政府采取果断的措施，首先在望疃开展反匪反霸斗争，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9年9月，县委、县政府抽调100多名干部，前往望疃区开展反匪反霸工作。我被分到茨河北葛寨乡。首先是组织力量，配备得力干部，建立工作组，每人发支枪。另外县大队又抽调一个排的武装，由指导员朱相林带领，赴茨北各乡、村巡回放哨戒备。

葛寨乡东起金牛寺，西至鹤庵庙，南至茨河涯，方圆四

十余里，是个土匪窝。葛前寨这个庄仅18户人家，镇反时就有6人被镇压。

在建立组织、加强领导的基础上，开展宣传工作。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人民解放军已取得的伟大胜利，蒋家王朝必定要完蛋，解放全中国已指日可待，以消除群众怕变天，怕工作队不能久留的思想顾虑。号召群众有苦诉苦，有冤伸冤。并分别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使群众提高了觉悟，壮大了胆子。接着，我们深入群众，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同时了解匪徒的罪行。开始群众不敢接近我们，后来我们主动帮助群众拉犁子、甩粪池、喂牲口，逐步与群众建立感情。群众把我们当作知己，才暴露了一些情况。例如葛东场庄苦大仇深的葛殿礼老人，儿子被抓去当兵（后来起义参加我军），儿媳被土匪霸占。这些受苦受气的人经过启发教育后，晚上跑到工作队的驻地诉说了被匪徒迫害的经过。就这样，打开了局面面，扩大了阵地，为对敌斗争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充分掌握匪徒罪证之后，我们立即对罪大恶极的匪首葛亚山、葛胖子、葛老天爷、贾成祥、季秀士等进行逮捕关押。又通过反复核实材料，准备召开斗争大会。为了开好斗争会，我们还召开一次模拟审判大会。由我扮演葛胖子，戴秀良扮演葛老天爷，马树生扮演葛亚山。当我们3人被反绑着带进会场时，群情激愤，一个接一个诉苦，要求政府依法惩办的呼声此伏彼起，甚至有些苦主跑到台上要打。

条件成熟后，对罪大恶极的匪徒、恶霸葛亚斌、郑风山等九人展开诉苦斗争，最后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大长了群众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从此我们工作队的同志每到

一处。男女老幼围着我们谈心、歌唱。晚上工作队的同志在哪里休息，民兵就主动站岗放哨，保护我们的安全。反匪反霸工作取得初步胜利后，就转入了生产自救，巩固乡村政权工作。茨北人民多少年来受尽了苦难。我们亲眼看到群众衣不遮体，食不裹腹，面带饥色。工作队遵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导，与他们同甘共苦。用上级从外地调来的玉米、荞麦进行救济，还发放一部分棉衣。号召群众多种菜，打油吃饼，挖藕渡荒，大搞副业生产，齐心协力战胜了灾荒，取得了反匪反霸与生救工作的丰硕成果。在各项工作中发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从中选举了代表，建立农会和党、团组织，巩固了乡、村政权。反匪反霸工作结束后，我仍留在那里继续工作，直到1952年8月离开。

时光易逝，弹指间40余年了，每当我忆起在那里并肩战斗、朝夕相处的同志和群众，倍觉怀念！我相信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勤劳勇敢的茨北人民一定能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繁荣，更加美好！

（上接第8页）

论：要是再晚解放几年，不知还有多少善良的人们被他们残害。四门村有位老人，教育他身边的孩子们：“共产党、毛主席为咱们撑腰，除掉那些祸害，让咱们安居乐业，可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报答共产党的恩情。”

韩油坊的一次公审大会

李蕴华

1950年10月20日，蒋瞳区政府在韩油坊庄召开公审大会，审判了一批土匪恶霸，处决了葛亚山、葛树荣两名血债累累的罪魁祸首，镇压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打开了反匪反霸的新局面，为受害者报了仇，雪了恨。广大人民无不扬眉吐气，感谢共产党、毛主席的大恩大德。

通知是上午9点钟开会。刚到7点钟，四面八方的人群就象潮水一样涌向会场。其中有学生队伍、群众团体，也有手持拐杖的老汉和由人搀扶的老太婆，8点钟会场里就聚成了人山人海。秧歌队、腰鼓队开始精采地表演；各单位的歌咏队开展热烈地拉歌比赛。这边唱：“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那边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震天动地！群情激昂、气氛热烈。一人多高的主席台，搭在韩油坊西南边的打谷场上，座东朝西。台上台下红旗招展，标语醒目，布置得庄严隆重，威风凛凛。会场周围岗哨密布，戒备森严，万余群众，秩序井然。

9点钟，大会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主席报告阐述了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和为什么要开展反匪反霸斗争。生动地报告，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当大会进行第四项，

把罪犯压上台，请苦主上台诉苦时，苦大仇深的苦主们怀着满腔怒火，一个个走上去，手指罪犯的鼻梁，哭诉自己受害事实，揭发罪犯残害人民的滔天罪行。台下群众听到苦主的字字血、声声泪的哭诉，人人咬牙切齿，个个义愤填膺，挥起拳头，不断高呼：“打倒恶霸葛树荣！打倒匪首葛亚山！杀人要偿命，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韩油坊韩佩轩的家属哭诉：“我的女儿被你们这伙强盗奸污，我丈夫被你们活活勒死，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家伙，真该千刀万剐！”一位姓王的老大娘质问罪犯：“我儿子碍你们啥事，无辜被你们杀害，连尸骨都不让俺见。”说着，放声大哭起来。有个叫陆迪安的苦主，也哭诉着说：“俺小孩娘刚生下孩子两个月，被你们抢去糟蹋杀害。撇下正吃奶的小孩成天嗷嗷直哭，俺倒咋过！”话未说完昏倒在台上。还有个苦主，刚上台就泣不成声，抓住罪犯就要咬。这时，台上台下的人都流出同情的眼泪。主席团的几位同志，亲切地搀扶着各个苦主，耐心地安慰他们说：“共产党、毛主席一定会给咱们受苦人撑腰，为咱们伸冤报仇！今后人民当家作主，日子一定会好起来！”12点多钟了，台上匪霸已低头认罪，台下苦主还纷纷要求控诉罪犯的罪行。大会主持人分别劝阻，宣布进行大会第五项，由当时的县教育科长周登岳代表蒙城县人民法院宣判葛亚山、葛树荣死刑，并命令立即执行。两名罪犯当即被拉出会场不远处就地枪决。

愤怒的枪声，为苦主们报了仇，雪了恨。围观的人们，有的责骂他们死有余辜，有的对他俩的尸体连吐唾沫。人们笑逐颜开，拍手称快。散会后，人们在回家的路上纷纷议

（下转第6页）

蒙城县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徐 嵩

建国初期，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蒙城县的农业和全国一样，都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农村经济体制从个体农业发展到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经过了一场重大的改革，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过，这确实也是一段很不平常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土地改革中，广大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由于耕畜、农具和农用资金的严重不足，仍无力做到精耕细作，更没有抗衡自然灾害的能力。因此，走组织起来、互相帮助、共同合作的道路，成了当时广大农民的共同心愿。

根据中央的有关规定和政策，蒙城县各级党委和政府都积极地发动群众，组织互助合作。从1951年到1957年全县实现了农业合作化，1958年全面转为人民公社，后又几经周折，到1962年才逐步稳定下来。

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大体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1.互助组阶段：1951年春，为了生产自救，蒙城出现了第一个农民自发组织的互助组——李伦英（女）互助组。李伦英是双涧人，因为带领组员拉车到双涧集卖劈柴，赚钱度过春荒，被评为全县第一位女劳动模范。接着又出席阜阳地区

劳模表彰大会，获得了地、县奖励的许多件农具，由组员们用大车拉回家。在那时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带头组织互助组，当了地、县的劳动模范，影响作用是很大的。组织互助组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等价交换”。互助组的土地、耕畜、农具仍归农民个人所有，只组织集体劳动，互助协作，各户收入全归自己，所以互助组的性质只带有社会主义的萌芽。

互助组分为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先组织季节性的临时互助组，条件较好的再发展成常年互助组。从这个名称上可以理解到：临时互助组是农忙季节全组集体劳动，平时的一般农活仍是各干各的。常年互助组是全年农活全部由集体参加劳动。全县1951年组织临时互助组7815个，常年互助组341个，入组农户占当时总农户10.1%。到1952年发展到临时互助组9778个，常年互助组2211个，入组农户占总农户的44%。到1953年，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的规模都有所扩大，组数虽有所减少，但户数都大大增加，那时临时互助组还有9237个，常年互助组还有1447个，而入组农户却增加到占总农户的72.6%。

2. 合作社阶段：1953年12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根据《决议》，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初级社）。初级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仍保持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农民将土地入股，集体劳动。分配原则是以劳为主，按土地劳力比例分红，有的地三劳七，有的地四劳六，土地分红比例最高不能超过五成。分红方法是估产摸底，预支试分，边收边支，最后结算。当时县里对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很慎重的，先重点试办，再全面推广。一开始县里直接掌握试办4个初级社，每社都派有

办社经验的干部驻社试办。城南九里侯侯翠峰合作社由孙长江同志去办，望疃李牌坊李绍堂合作社由秦良甫同志去办，城西三里庄吴腾云合作社由陆德武同志去办，上述三同志都是由县农委会派去驻社的。还有马集葛素来（女）的一个合作社，（办社干部的名字记不清了）。那时每发展一批农业社，县里都先举办一期训练班，专门培训骨干，并组织重点社社主任介绍经验，侯翠峰、葛素来等同志的每次介绍，都起着很好的带头引路作用。到1954年上半年，全县已办起79个初级社，入社户数占总农户的3%。1955年，从上到下批判“小脚女人”作风，掀起了合作化高潮，经过一个冬春，很快发展到548个初级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2%。

在初级社的基础上，不久又组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高级社）。高级社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取消土地分红，将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全部折价入社，变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高级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代表大会，建立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分别选配主任1人，副主任和委员若干人。1500户以上的大社，下设工作区，工作区下划分生产队。达不到1500户的小社，不设工作区，由社直接领导生产队。高级社一成立，就要制定本社的章程（即社章）并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然后根据社章分别制定有关规章制度。高级社的管理办法是按土地好坏、农活难易，实行包工包产，按劳动定额计工分或按件计酬。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多劳多得。1955年全县办起114个高级社，1956年发展到164个，1957年达到195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70.2%。

从全县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情况看，在互助组和初级社期